

§ 历史学研究 §

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浅析

许洁明, 李 强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是工业革命中形成的新兴力量, 其道德观随经济实力的强大逐渐获取主流价值观的地位, 促进英国社会现代伦理观念的建立。研究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形成的历史、社会及宗教因素以及二元性, 可以对其在引领英国新兴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及工业化时代的英国社会有所了解, 为高速发展的中国工业社会伦理道德观的建构提供借鉴。

关键词: 新兴工业资产阶级; 三维道德观; 二元性; 成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 K561.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11) 01-0055-09

一、关于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的理论界定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 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的同时, 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流社会的道德观从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贵族引领, 进入了工业资产阶级新兴道德观强力嵌入的时期。在深入展开论述之前, 首先对几个重要概念进行理论界定。

“工业革命”一词在历史学中的运用非常广泛, 如果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似乎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术语。最初“在17世纪中期英国人使用的‘革命’是指事物发展像车轮一样又转回了原地, 它所指的乃是‘循环’、‘往返’, 并没有进步的含义, 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使‘革命’一词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使用, ……并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不加区别地用以指谓人们认为是新兴的、带有进步性的、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历史现象。……但使用这一术语时, 经济发展中的持续性和非人为因素, 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了”^[1]。所以, 这里使用这个术语并非指代整个工业化进程, 而仅仅取其

表示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这个因制造业勃兴而带来英国社会结构及其相应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的“中时段”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有具体时间限定的约定俗成的用法, 它仅标识一个具体的研究时段, 其表征是在“英国工业化”这个历史长时段中变化最快最集中的一个世纪。当然, 由于文化价值观念的研究很难取其一个界面切割分明的时段, 所以下文的研究在材料取舍上有时会有小小的前移和后越。无论如何, 说“工业革命”对英国这个世界第一个工业化社会^{[2]4}的伦理道德观, 及其对当时欧洲的道德观念的价值取向带来了深远影响未尝不可。

对于“阶级”的理解,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代表人E·P·汤普森认为: “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 它把一批不同的、似乎无关联的事结合在一起, 它既包括在人们的经历中, 又包括在人的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 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 更不是一个‘范畴’, 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事实上发生(并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当我们把历史停留在某一时刻, 我们看不到阶级, 只能看到各种不同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社会变化时期内看这些人时, 我

收稿日期: 2010-09-28

作者简介: 许洁明(1950—), 女, 江苏新沂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李强(1981—), 男, 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们就能概括出某些类型的关系。……当一部分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长辈那儿传承的,还是自己体会到的),感到并明确表达他们的共同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的兴起并不像太阳那样会在预定的时间内升起,而只会在自身的形成中表现出来。”^{[3]9-11}可见,阶级是在人们长时期生活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以共同利益把许多有共同经历的人捆绑在一起,而这个共同利益当中最根本的是经济利益。但是由共同经历、共同体验而形成的文化观念形态上的认同,却是阶级形成不可或缺的东西,这正是本文考察的理论意蕴。与“阶级”相关的是“等级”、“阶层”等概念。等级是“一群具有同样身份的人,也是一种地位,附属于它的有一系列的权利和职责、特权和义务、法定的资格和无资格,这些均为社会承认,它们能够由公共权力、在许多情况下由法庭规定并强制执行”^[4]。等级是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它是按照人们的地位、身份、门第、职位、生活方式,甚至于血统建立起来的社会分层体系。与主要由经济利益决定的阶级地位不同,不管是拥有财产的人或是无财产的人,都有可能属于同一等级。阶层则是指“社会各成员在社会报酬与资源占有方面分享类似位置与类似权利的一个社会团体”^{[5]28}。社会资源往往不能绝对平均到每个社会成员的手中,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人们收入、职位、受教育等方面的不平衡,而在对社会资源的攫取过程中,一部分人在事实上,有时也会在心理上成为一个群体。阶级与阶层的区分是:阶级的定义更加强调它是一个较为笼统的,主要基于经济利益分配而可以具有平行视野的实在概念;而阶层则注重把这个实在概念分为纵向的各个切面。比如,我们可以把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看作是工业革命时期兴起的一个平行横越英国社会,具有共同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因之产生“阶级利益与阶级认同”的阶级,而把工业资产阶级中的大制造业主和小工厂主归为不同的阶层。

关于工业资产阶级,马克思·韦伯强调说,“阶级”应是指处于相同地位的人群,有产阶级应该是指一个主要由财产的不同来确定其阶级地位的阶级;职业阶级应该指一个主要由商品或劳

动效益的市场利用机会来确定其阶级地位的阶级;社会阶级应该指前面那几种阶级地位的总称,在它们之间,在个人和上下几代人当中,可能很容易发生变化,而且一般也发生着典型的变化^[6]。工业革命前的独立手工作坊主,工业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发明家、商人、穷苦学徒以及小贵族,他们通过投资工业而成功,经济、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并逐步形成了与其他阶级或者说阶层不同的共同利益和自我认同。于是,就形成了 18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特有的一个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通过他们在制造业领域的成就及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心转变逐步跻身于统治集团,与土地贵族一起掌控国家经济命脉,通过议会改革得到参与执掌国家政权的机会,成为当时极其独特的一个社会阶级。同时,在其经济利益趋向一致和文化认同塑型的过程中逐步构建了一种不同于土地贵族的文化观念,其中包括工业资产阶级自己的伦理道德观。

在西方,“道德”一词源于拉丁语 *mores* 原表示风尚习俗,后演变成内在本性、伦理、品德等意思,也具有规则、规范等含义。英语中的 *morality* 就是由此而来。美国学者蒂洛说:“道德基本上是讨论人的问题的,讨论人同其他存在物(包括人和非人)的关系如何。道德讨论人如何对待其他存在物,以促进共同的福利、发展和创造性,努力争取善良战胜丑恶、正确战胜错误。”^[7]严格地说,“道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道德”通常与“伦理”通用,涵指一切可以作善恶评价的社会道德现象,它既包括个体的品德修养,也包括社会客观的伦理关系。狭义的“道德”相对于“伦理”而言,仅指社会成员个体的品德修养,“伦理”则指社会客观的伦常关系,个体的主观道德修养往往以客观的社会伦常关系为基础。虽然“道德”与“伦理”范畴之分在现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讨论的主题所限,本文则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道德”这一概念。道德观是在道德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对行为进行判断的思想观念。主要以行为体现出来的道德现象是道德观形成的客观事实,同时也是对行为主体客观道德现象的主观反映。既然道德观是对道德现象的主观认识或反映,那么,就必然引发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不

同的认识主体, 由于不同的原因, 或者是出于不同利益集团对于既有利益损益的不同态度, 或者是出于认知能力的缺憾及认识的偏颇, 对同一道德现象往往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认识, 而这种认识日积月累的重复就形成了固化的道德观; 由于人们对社会同一道德现象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 也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同样, 道德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在同一社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时期, 道德观也会具有不同的价值倾向、具体内容和行为要求。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是随着工业革命发生、发展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无论它在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变化还是在意识形态中价值取向的变化, 都会对其阶级的新兴道德观的形成产生影响。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从以手工工场为主的生产方式过渡到以大机器工厂生产为主的方式, 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在这个工业社会中, 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们在价值观念上相对于农业社会都会发生变化, 作为一个阶级的道德观也不例外。

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与他们投资工商业的成功密不可分, 因而不可避免地形成以“金钱至上”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许多新兴的工业资产者出身低微, 不像传统贵族那样具有被当时社会称道的“教养”和“风度”, 而他们却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各种工业活动, 积聚大笔财富, 跻身社会上层, 置身于传统贵族与无产者之间。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渴望摆脱原有的地位而与旧贵族平起平坐, 但他们与生俱来地缺乏传统的权威和特权优势。因此, 他们在追求“巨大财富”的同时并不完全崇尚传统的“高尚道德”, 反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元道德观。由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来源十分复杂, 加之工业革命促使其经济地位急剧变化, 作为雏形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就较为混杂, 以至于我们只能说有可能去探察其道德观的一种向度, 而不是一种完全固化了的東西。而一般来说, 从三个维面, 即职场、家庭和社会公共生活方面探讨是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道德取向作论述和分析的最好视角。

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职业道德观

英国工业资本家的兴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以一个阶级的面目出现则是 18 世纪 60 年代前后的事情。罗巴克¹等人通过创办工厂, 雇佣工人, 积累了大量资本。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 使大批罗巴克这样的工业资产阶级先驱通过技术革新走上成功之路, 改变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在这一过程中, 以“向钱看齐”、“金钱至上”为内在驱动力,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表现出以下的职业道德观。

第一, 成功的工业资本家具有积极进取的冒险精神和强烈的敬业精神。冒险精神意味着不拘泥于传统, 不断开拓进取、勇于创新, 即便形势并不明朗, 有可能事倍功半, 依然勇往直前。敬业精神是劳动者在工作中热爱自己的职业、勤奋努力、尽职尽责的道德情操。冒险精神和敬业精神绝非只存在于工业革命时期, 也并非只属于一个阶级, 将它们作为工业资本家职业道德观的一个方面, 是因为这两种精神在这些工业创业者身上有着孪生性、强烈性, 且都与巨大财富的诱惑密不可分。在工业革命这一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特殊时代, 人们对获得财富有着极高的热情, 希望通过拥有巨额金钱来巩固甚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同时因循守旧和懒散怠惰使人丧失财富和地位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 贵族、手工作坊主、自耕农、手艺人、发明家等形形色色的人投资于制造业, 尽管有破产的可能他们仍然坚持; 尽管工作辛苦他们依然敬业。理查德·阿克莱特是一个兰开夏普莱斯丹贫困家庭出身的理发匠, 兼做买卖头发的小生意。他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来改变现状, 于是专心研究纺织机械, 发明了水力纺织机, 并倾其所有在科罗姆福德建立纺织厂, 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后在各地建厂并因此发财, 后被封为勋爵。具有传奇色彩的工业资本家欧文在麦克古福德先生那儿做学徒时, 每天只有 5 小时睡眠时间, 仍抽空到富裕主顾的私家图书馆读书, 18 岁时就掌握了棉花贸易的知识^[8]。

¹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 14 卷第 335 页注释为: “Roebuck John 罗巴克 (1718-1794) 英国医生、化学家及发明家。大概使他最出名的是他资助苏格兰工程师 J 瓦特试验制成一台工业用冷凝式蒸汽机 (1769)。18 世纪 60 年罗巴克在格兰斯特灵郡的卡隆创办一家铁厂, 进行各项发明与改进。”

第二,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注重诚信、笃实待人。他们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¹,为追逐更多的财富注重遵循市场经济规则。诚信笃实是市场经济下除“价值规律”外的又一基本规则,失信和欺诈尽管可以在短时间内带来利润,但从长远来看则严重影响企业形象,损害企业的社会信誉度,进而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正常秩序,阻碍企业的发展,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大多数英国工业资本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在 1795 年的制造商会议上,博尔顿曾说:“我们不要忘记诚实策略始终是最好的策略,交易上的诚实不会不对城市的一般商业和对我们每一个商号起着最好的作用。”^[9]斯塔福德郡伯斯伦城的乔赛亚·韦奇伍德一方面拼命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努力保证产品质量,他反复试制的白底蓝花碧玉瓷销售市场一直庞大^[10]。可见,诚信对于把企业看成事业并希望长久盈利的工业资本家来说极其重要。他们的这种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反复重复内化为一种道德方面的价值观念。

第三,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提供给工人的工作条件及报酬极差。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业精神破坏着原有的社会关系,促进着自我利益的不断膨胀”^[11]。工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在扩大市场、改进技术的同时拼命降低成本。工厂等生产工具是资本家及其合伙人的私有财产,而市场的扩大与产品生产的数量和速度密切相关。在这种“铁的工资规律”下,工人成为任其摆布的“机器”的一部分,“已经变成了单纯的‘工具’,或者可以说是众多投入成本中的一项”^{[3]203}。厂主常常延长劳动时间并尽可能压低工资,清晨“经常可以看到三十或四十个工人站在工厂上锁的大门外,带着罚款簿的人却在工厂的车间里乱转,把缺工工人的织机数目记下来。……实现这种文明抢劫的办

法就是把时钟向前拨半小时”^[12]。他们对工人进行剥削压榨的同时又披上了伪善的外衣,“长期以来削减工资不仅迎合了雇主的贪婪,同时也得到一种‘大众接受’的理论的支持,这种理论认为贫穷是工业发展的刺激物”^{[3]277}。工业资本家表现出的这种穷凶极恶是与传统伦理道德相悖的“恶”的负面道德取向,与前述的冒险、敬业、诚信大相径庭。这种在“血汗工厂制度”时代的“恶”不仅反映了其道德观的二元性,而且在英国也最为显著,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抹不去的污点”。这种看似善恶矛盾的道德取向从根本上说是受“金钱至上”的核心道德观所左右。由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法律及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妇女儿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厂主为了更多牟利,大量使用劳动报酬较少的童工及女工。1839 年,在大不列颠的 41.956 万工人中,有 19.2887 万人年龄在 18 岁以下^[13],童工占全部工人数的 46%。事实上,在奴隶状态下的童工比在地狱般的殖民地的奴隶更加悲惨^[14]:“在大工厂里,1/4 或 1/5 的孩子或者是跛子,或者手足变形,或者由于过分的辛劳,有时因残酷的虐待而变成终身残疾。小孩子很少能坚持 3-4 年而没有严重的疾病,往往过早地死亡。”^[15]女工也受到不公正待遇,“全日制女工的平均工资大约是男工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左右”^[16]。所以,牛津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约克·鲍埃尔在 1901 年写道:“英国人民从来不是由于瘟疫、饥馑或战争,而是由于建立了没有正当保护措施的工厂制度,才使自己的生命力遭到如此致命的打击。”^[17]

三、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家庭伦理观

家庭是微观社会组织形式,它构成了社会结构中的最小单元,或者说是社会的细胞^{[18]126}。

¹ 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简明大英百科全书 18》第 474 页注解为:“伦理学中的一个传统,起源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穆勒。其基本原则是:一种行为如果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如果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功利主义与伦理学说不同:伦理学说在评价行为的正确或错误时,不考虑行为的结果,只按当事人的动机来判断行为的是或非,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不好的动机也可能做出好事。对于结果的概念,功利主义者将行为所产生的好坏结果都包括在内,如果两种行为的结果差别不大,则功利主义者认为它们之间的选择不存在道德问题。”

马克思指出:“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经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52 页。

» 美国学者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血汗工厂制度较之美国残酷得多,这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也是人类为工业化付出的巨大代价。见 Lanny B. Fildes, Russell L. Barber, Cheryl A. Riggs, *The Global Past* Boston, 1998, p. 796

由此,“家庭伦理观”是细究资产阶级在私领域的深层次道德观的一个维面,也是一个折射其道德观取向的窗口。家庭一般有扩展型家庭和核心型家庭两种典型形态。核心型家庭这一概念是1949年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在《社会结构》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指新婚夫妇离开父母另立新居,并由夫妻及其未婚子女两代人组成的小型家庭。这种家庭单位主要包含夫妻间的两性关系和亲子间的单层代际关系。扩展型家庭也称复合型家庭,则是由三代及其以上的家庭成员组成的家庭模式,包含多层代际关系、两性关系、亲戚关系甚至于奴仆关系。当然在“核心家庭”与“复合家庭”中间存在一种劳伦·斯特称之为“扩大的核心家庭”,多指在核心家庭亲子两代和夫妻关系的基础上,包括同居而不具备家长制权力的丧偶祖辈,以及一些直系非直系亲戚以及同住的学徒等^{[18][126]}。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家庭形态主要是核心家庭^{[19][175]}。“大家庭制度在生活只够温饱的社会里有着巨大的优越性,而对经济正在增长的社会来说却并不合适。在这样的社会里,这几乎肯定会妨碍人们努力工作。经济的增长取决于积极性,如果作出努力的个人必须与许多其他人分享他的报酬,而他又不承认这些人有这种权利的话,那么这种积极性可能被窒息。”^[20]在西欧和北欧前工业化时代,几代同堂的复合家庭在文化习俗方面几乎已经广泛地无立足之地了,只有大贵族为家族利益和延续古老习俗而使之存在^{[18][127]},更不要说,工业革命先驱即新兴工业家更多地生活在核心型家庭中。所以,就工业资产阶级处理两性关系及亲子关系的道德观进行探讨是管中窥豹,既可以看到这个新兴阶级在私领域的道德观,又折射出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

在家庭两性关系的伦理道德方面,第一,对于许多新兴工业资本家而言,只有爱情没有钱财的夜晚是美好的,白天则是悲哀的。这种道德取向与他们在反封建时鼓吹的为两个灵魂的结合而排除物质考虑的婚恋观不一致。这一时期,由于创业生活状态的压力,有的工业资本家认为爱情与婚姻也像工业生产、商品交易一样要“有利可图”,想要事业有成,就要和有上层社会关系或富裕之家的儿女结婚。当时,工厂主常刊登这样的求偶广告:“某工厂主,退役军官,经济境

况良好,31岁,诚实正派,容貌出众,和蔼可亲,专注事业而无暇结交,欲通过广告在不久的将来与容貌姣好之女子缔结幸福婚姻。希望拥有财产15万或20万……”^{[21][236]}。这则广告凸显了财富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工业资产者一般结婚较晚,因为经过从无到有的创业而具有知名度时已经在30岁或35岁了;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加速了人口地区间的流动,为了追逐财富,许多繁忙的工厂主或希望成为工厂主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寻求发展,其中不少人忌讳婚前性行为 and 婚后移情别恋,妓女、女工甚至童工成为其满足性欲的工具。“厂主是女工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22]作家古特曼曾对英国新兴工业资产者一边肆意淫乐,一边又装腔作势的样子作了形象的描述:“这里所有的男子,也许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保持着对妻子的忠诚,但在别人面前他们却装出似乎对妻子忠诚的样子,而别人都很了解,这样维持名誉的代价如何。”^{[21][331-332]}

但是,工业革命时期的新兴工业资产者在家庭两性关系中的道德取向也有其良善的一面,作为一种从阶级整体考察的道德观同样具有善恶同存的二元性。“资产阶级家庭的父亲,整个白天都得处理艰难的生意问题,只有当他回家的时候才能休息……家人团聚的夜晚,对他来说就是最纯净也是最快乐的时光。”^[23]可见,对于多数工业资产者来说,家是他们躲避奔忙而得到宁静的好地方。尽管这一时期的两性关系并不平等,妻子及其嫁妆多归男性所有,但厂主们总是希望能给妻子以充分的物质生活保障,使妻子不为家庭生计操心,他们将家庭丰衣足食看作是区别于普通劳动者的重要方面,是成功和地位的体现;而妻子也要做好贤妻良母,在维持家庭舒适和安逸的同时,默默无闻地为丈夫排忧解难。老罗伯特·皮尔爵士是富有的棉花加工厂主和塔姆沃思的议员,他的妻子“在每一个紧要关头,都是其丈夫具有高尚灵魂的忠实顾问;婚后许多年来,她始终担任他的抄写员,指导他在业务上通信往来的主要部分。因为皮尔先生本人对写信不感兴趣并几乎不懂”^[24]。

第二,关于亲子关系中的伦理道德。在英国工业资产者努力创业的那个时代,儿童在社会经

济活动中是一种可成长和再生的活的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的生产性。在一个人口增长以高生育率与高死亡率并存的时代,人们认为父母有权力支配儿女,并对孩子的生存持宿命论的观点:出生时或童年夭折是上帝的旨意,将由其他孩子的出生得到补偿。一些人认为孩子长大后外出谋生远离自己,所以在孩提时代就该帮父母做事。《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曾经是发过大财的砖瓦厂老板,当他看到年幼的孩子在家庭作坊中干重活时总是很高兴,并杜撰出一条谚语:“省下了棍子,惯坏了孩子。”^[25]纺纱机发明者克隆普顿受过良好教育,事业有成,妻子贤良,全家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远远优于普通人,但克隆普顿的儿子在学会走路后不久就开始学习纺纱织布。他在成年后回忆道:“母亲经常把棉线放在铁丝筛里敲打,然后把线放到深褐色的槽里用浓肥皂水处理。那时,母亲把我的衣襟卷起来,把我放到槽子里踩线。在做第二次准备工作时,又把我抱出来。放进水后,我又继续踩。因为一直要踩到槽子被装满为止,我在槽子里站不起来,所以母亲在槽子旁放上一把椅子,让我靠着干活儿。”^[26]这样的养育方式是优是劣后人很难评述。

在基业壮大和功成名就后,许多工业资本家又竭尽全力培养子女,一方面是人类共有的血缘亲情所致,自古以来,无论贫富贵贱,“父母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抚养和支持子女,为其生命而担忧,为其进步而满足,并不索取任何回报”^{[18]139}。工业资本家有足够的财力去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希望能给后代最好的生存发展平台;另一方面,工业资本家也有试图通过培养子女来显示自己社会地位并跻身于贵族行列的意图。“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出身于棉纺作坊,没有教养,没有礼貌。他们只有与曼彻斯特交易所的商人做交易中获得的些许知识。但是,为了弥补那种缺陷,……他们把子女送到最昂贵的学校去培养,决心要把自己没有的东西双倍地给予后代。”^{[3]200}出身的相对低微成为新兴工业资产者经济地位提升后极力要掩去的“伤疤”,他们认为自己与贫穷的社会低层人群已经完全不同,相对高人一等,但是,又没有传统贵族那样值得称道的风度、教养、生活方式,更不要说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了。他们培养子女,既是出于对子女

前途的考虑,也间杂着把“子女”当作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工具的下意识观念。

四、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社会公德观

英国工业革命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及其对立面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壮大的时期,两大对立、互生而共存的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一点主要集中在劳资关系上。“劳资纠纷在机械装置和工厂产生以前就常常发生,而且很激烈。自从生产资料不再属于生产者起,自从形成了一个出卖劳动力的阶级和另一个购买劳动力的阶级时起,人们就看到不可避免的对立的出现。”^[27]面对不断高涨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工厂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大多数有产者感到有必要整理好穷人的房间”^{[3]56},只有这样才能更冠冕堂皇地继续剥削他们。

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一部分工业资产者在缓和劳资矛盾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早期工厂由于对水力的依赖,大多坐落在偏远乡村的河流两岸,所以资本家要为从异地招来的工人提供基本住房和其他待遇。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起保护工人的责任,因此在工厂周围提供一定的生活设施,并监护工人的道德品质。他们不仅规定每个工人星期天一定要做礼拜,而且对打架吵骂、夫妻不和、张家长李家短的大小事情全都过问。他们把自己的工厂看成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自己就是这个小世界的‘君主’”^[28]。这种思想与工业革命前的家长庇护制密不可分。所谓“家长庇护制”是指社会地位高的一方用父亲般的方式来关怀和支配另一方,这种关系以另一方承认其权力以及对这种依附性的认可为基础,是一种不平等的利益互惠关系^{[18]160-161}。既然工业资产者有权去管理工人,这些小世界的“君主”就认为只要工人在自己的工厂工作,就要以慈父般的行为对待他们。欧文的岳父戴维·戴尔在新拉那克就是这样,他坚持让500名童工“分开睡在一些通风的屋子里……一天工作13小时,中间有一个半小时吃饭”^[29]。相对于当时严苛的工厂主来说,这样对待童工已经很不错了。早期工业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来自贫苦的劳工阶层,他们深感工人生活的艰辛。像博尔顿、韦奇伍德、皮尔、欧文等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尽力改善工人的生存条件。欧文

1771年出生于贫苦马具匠家庭, 10岁就在布行做学徒, 18岁受雇于曼彻斯特一家布匹批发零售商。19岁那年, 他借来 100 英镑与另一合股人创办了自己的纺纱厂。后来, 欧文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逐步管理了新拉那克四家纺织厂的 2500 个工人。处在原始资本积累由传统转入现代的转折点, 欧文目睹了财富分配的巨大悬殊, 体验了工人阶级的贫困。他认为企业主不能只考虑自己赚钱, 还要考虑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新拉那克, 于是说服其他股东, “为厂里 10 岁的童工制定了最低工资, 为 10-18 岁之间的工人规定了每天 12 小时 (包括一个半小时的用餐时间) 的工作时间, 建立了学校, 为 3 岁以上的孩子制定了启蒙教育的大纲”^[30]。后来, 他购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德国宗教团体于 1818 年建立的名为哈莫尼村社的所有建筑物和三万英亩土地, 并将此地命名为“新哈莫尼”, 进行空想共产主义的实验。虽然实验最终未能成功, 但其中反映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社会公德观难能可贵。欧文的实验表明了“虽然作为个人主义对立面的庇护制在一些大工厂主那里仍然有效, 但这绝不是多数情况, 许多工厂主对工人的政策仍表现出个人主义”^{[19]201}。

英国工业革命早期, 整个社会普遍流行着“自助”的思想观念, 工业资产者也不例外, 他们认为“贫穷并依附有权势的人会带来个体道德的下滑, 是对个体的不负责”^{[2]189}。所以, 大多数工厂主在创业阶段很少去考虑自身对社会的责任, 而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更多地盈利; 但是, 当工厂主们功成名就后, 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进行私人慈善救助。所以, “一些学者发现在 18 世纪中期的慈善事业有所减缓, 但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仁爱仍有所表达”。作为有产者, 一些激进的工厂主对慈善事业保持着较高的热情, 他们通过向慈善组织捐助资金来帮助解决家庭贫困孩子的教育、穷人的医疗、寡妇的生活等社会问题。“作家兼工厂主的帕特里克·科恩宽写道, 在 1806 年私人慈善机构一年支出的慈善金有 400 万”。“在 1719 年到 1756 年有 5 家私人捐助的医院建立起来, 其中第 5 家是由伦敦富商托马斯·盖单独遗赠的。在 19 世纪 30 年代这所医院声称一年可以治疗 5 万多名患者”^[31]。通观工业资产阶级的社会公德观, 同样

可以发现与其职场及家庭道德观相同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从根本上来说, 仍是为了在更长的时间里赢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五、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成因浅探

道德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其形成既是时代的产物、现实社会的造就, 更有深层的历史文化传承的因素。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来源于英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 又构成不断发展的工业社会文化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绅士文化是英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集中概括, 它以贵族精神为基础, 一方面贵族精神吸取各阶层的部分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普遍向社会上层看齐, 这种向下吸取和向上学习的双向流动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融合, 最终形成了绅士文化, 成为整个英国社会全民的文化精神。”^{[5]357}绅士文化同样以“向上看齐、向上学习”的方式深深影响着新兴工业资产阶级, 成为其形成的文化渊源。

首先, 以贵族为首的英国人“生而自由”的传统是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最早从贵族与国王的抗衡中产生, 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到诺曼征服后, 英国贵族与国王一直坚持着“权利”的抗争, 王权应该受到限制的观念在英国逐渐形成。中世纪以来, 贵族通过制定法律来确保对王权的限制, 社会也因此逐步形成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1215 年大宪章的颁布使城市自治权、市民利益、商业自由、私有财产有了明确的法律保护; 15 世纪中期红白玫瑰战争使城市市民和商人的社会政治作用日益增长, 工商业活动得到王权的大力支持; 1640 年的内战和 1688 年的光荣革命使王权受到巨大削弱并建立了立宪制政体, 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

相对“自由”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环境使寻求自身的改变成为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追求, 也为工业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与开放的物欲观紧密结合, 使“合理谋利”精神应运而生。“所谓‘合理谋利’, 是与在前工业社会中以非经济的强制手段吞占社会财富为特征的谋利手段相对而言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创造新的财富以求致富, 谋利者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 ……而且除

此‘合理’手段之外,也并未完全放弃不合理手段的继续采用。”^{[32]93}可见,工业资产阶级有着对财富的贪欲,但资本主义精神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穷凶极恶地敛财聚富。资本主义精神也涵盖对这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至少是一种在物欲追求热潮中的理性调和。所以,在工业资产阶级的职业道德观中有着冒险进取、敬业笃职、诚信良善的一面,在其社会公德观中有着改善劳动者生存条件的努力,它们来源于“自由主义”的养成和对“合理谋利”的敬畏。

第二,开放的社会结构是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形成的社会因素。工业革命前英国就形成一种相对开放的三层式社会结构,由于中产阶级的存在,各阶层之间自由流动性较大。对于13至18世纪的英格兰,艾伦·麦克法兰论述道:“首先,高度成熟的、个人主义的市场化社会,可以导致非同寻常的富足,而且财富会广泛分布于全民。其次,一种社会流动性极大的局面会出现,流动的基础是财富,而非血缘;同时在职业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几乎没有牢不可破的永久屏障。”^[33]这种没有“永久屏障”的社会结构很自然地使中下层产生“通过经济实力的改变能够很容易从社会的底层上升到顶层”的观念,于是中下阶层的“冒险精神”、“勤奋创业精神”、“敬业精神”随之产生。而作为英国国粹的“贵族精神”一直对社会各阶层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传统贵族的“文化优势”仍影响着整个社会,“尽管经济利益上尖锐冲突,政治要求上各不相同,在文化精神方面却呈现出中层模仿上层,下层模仿中层的局面,而作为英国民族特色的所谓‘绅士风度’,就是在这种模仿中形成的”^{[32]440}。欧文的社会公德观至少在文化精神上有模仿贵族款待行为¹和家长庇护制的渊源。当然,企图跻身于贵族行列,在行为上试图保持“绅士风度”,使工业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及道德行为具有了美好的一面。

第三,新教伦理是工业革命时期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形成的宗教因素。20世纪初,马克思·韦伯出版脍炙人口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做了大量社会调查后得出结论说,多

数成功的资本家都是清教徒,并进一步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因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34]韦伯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中有一种来自基督教新教的伦理,这就是在富裕的生活中不追求肉体的物质享受,而要通过艰苦劳动、节俭、诚信在今生而非来世得到拯救。虽然资本家成功的一个信条是“赚钱、赚钱、再赚钱”,但在赚更多钱的同时,又必须“遵守生命的自发的天职”。人既然是上帝的造物,上帝就一定希望人能幸福,这种幸福不是声色犬马、骄奢淫逸,而是人类自由的张扬和潜力的发挥,在财富创造方面也是如此。新教徒应该尽力合乎理性地创造尽量多的财富,才能为上帝增光。这种明确的“为上帝的荣誉而赚钱”的宗教训导是新教的一大特色。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新教教派卫斯理宗,又称“循道宗”或者“卫理公会”,在矿区和工业地区大规模传播,它特别适应自立起家的工厂主和制造业主以及工头、监工等一批人的心理需要。“人们渴望自己能拥有健全的头脑、潇洒的风度、优良的性情,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人们的尊敬。这种对自身素质的严格要求正是卫斯理宗所要求的”^[35]。这种近乎完美的呼吁对工业资产阶级有着不小的号召力,它连同“生而自由的传统”和“开放的社会结构”一起,使工业资产阶级不仅仅要“向上看齐”,更要实践新教理论中包含的资本主义精神,最终形成了工业革命时期工业资产阶级独特的二元道德观。这种与时俱进的价值取向,向上嵌入了仍占主流地位的贵族文化观念,向下引领中产各阶层和工人阶级伦理道德观的形成,并最终推动英国绅士文化现代性的不断发展。

六、结语

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是在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需要中,借助于传统文化素养与新教伦理逐步形成的,并非仅为工业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简单催生,更重要的是历史文化中“生而自由”的传统、开放的社会结构以及新教伦理的巨大作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追逐财富又崇尚

¹ 款待是中世纪一种基于基督教神恩的关爱行为,它是指某人家里对无论邻居和陌生者各色人以亲切,特别是用肉类、酒饮和住宿以慷慨地招待。见张佳生:《近代早期英国的款待观》,载《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6期。

天职, 敬畏上帝而尽可能合理谋利; 既努力奋斗 又盘剥成性; 将两性关系和亲子关系资本化, 又 深谙人类共有的人性爱和人伦美, 其二元性表现

参考文献:

- [1] 许洁明. 殊途同归——近代欧洲工业文明的兴起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21-22
- [2] 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914 [M].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76
- [3]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3
- [4] 沈汉. 西方社会结构的变迁 [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88: 156
- [5] 舒小昀. 分化与整合: 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8
- [6] 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上)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333
- [7] J. P. 蒂洛. 伦理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9
- [8] Brinley Thom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122-123
- [9] 保尔·芒图.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310-311
- [10] 戴维·罗伯兹. 英国史 1688年至今 [M]. 鲁光桓, 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0: 81
- [11] Christopher Harvie, Graham Martin, Aaron Scharf. Industrialisation and Culture 1830-1914 [M].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70: 12
- [12] 罗伊斯顿·派克. 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42
- [13] 马克思. 资本论 (一)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479
- [14] May Trevor.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 [M]. New York: Longman, 1987: 67
- [15] Brinley Thom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134
- [16] E. H. Hunt. British Labour History 1815-1914 [M]. Atlantic Highlands,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81: 104
- [17] 阿萨·勃里格斯. 英国社会史 [M]. 陈叔平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225
- [18] 许洁明. 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 [M]. 北京: 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4
- [19] Charles Moore. The Industrial Ag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Britain 1750-1985 [M]. London: Longman, 1989
- [20] 刘易斯. 经济增长理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119
- [21] 爱德华·傅克斯. 欧洲风化史: 资产阶级时代 [M]. 侯焕阁,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236
- [22]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M]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435
- [23] E. Shorter.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230-231
- [24] E. Royson Pike. Human Documen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M]. London: Allen & Unwin, 1966: 36
- [25] 约翰·巴特勒, 等. 西方社会史 (二) [M]. 霍文利, 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33
- [26] 约瑟夫·库利舍尔. 欧洲近代经济史 [M]. 石军, 周莲,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197
- [27] 保尔·芒图.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M]. 杨人梗,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53
- [28] 钱乘旦. 第一个工业化社会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238-240
- [29] 玛格丽特·柯尔. 欧文传 [M]. 何世鲁, 马爱农,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5: 49
- [30] Oliver Macdonagh. The Early Victorian Government 1830-1870 [M].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7: 25
- [31] Royle Edward. A Social History: Modern Britain 1750-1985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7: 180-181, 183-184
- [32] 钱乘旦, 陈晓律. 英国——在传统与变革之间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 [33] 艾伦·麦克法兰.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M]. 管可秣,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165
- [34]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170
- [35] 周文英.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宗 [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2000 (5).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Ethics of the New Industrial Capitalist Class

XU Jieming LI Q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Abstract As the growth of their economic strength, the newly emerging British industrial capitalist class came to dominate the main currents with their own ethics, which eventually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modern morality.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element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t ethics is a good way to understand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ts' lea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ly rising cultural values as well as the British society in the industrial era. It can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ety that is experiencing a rapid development.

Key word: capitalist ethics; duality; a result of analysis

(责任编辑: 黎原)